



# 论早期秦文化的来源与形成

梁 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西安 710069)

## 目 次

- 一 序言
- 二 商文化因素
- 三 周文化因素
- 四 西戎文化因素
- 五 早期秦文化的形成

## 一 序 言

早期秦文化是指西周至春秋前期,或公元前 677 年秦德公居雍以前的秦文化。秦文化的很多特点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文化来源问题引人关注,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已有八十年的探索历程。从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看,早期秦文化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者主要为西周中期,以清水李崖遗址为代表,其遗存可称为李崖型;后者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包括礼县西山坪、大堡子山、甘谷毛家坪,以及关中西部的一些春秋早期遗址,其遗存可称为西山型。早期秦文化经历了从李崖型到西山型的转型<sup>〔1〕</sup>。如果把秦文化作为一支考古学文化来对待,将会发现其早期遗存的文化构成主要有三个来源,即商文化、周文化和西戎文化。

## 二 商文化因素

据《史记·秦本纪》,嬴秦先祖与殷商关系密切,从而导致周代秦文化在某些方面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殷商遗风。

〔1〕 梁云:《论早期秦文化的两类遗存》,《西部考古》第 7 辑,三秦出版社,2014 年。

### (一)腰坑和殉狗习俗

在春秋至战国早期秦墓中,等级越高,带腰坑、殉狗的比例就越高。据统计,在出土一至三件铜鼎的士级墓中,带腰坑的占 11.8%,殉狗的占 14.7%。在出土五至七件铜鼎的大夫级墓中,带腰坑殉狗的占 44.4%〔1〕。秦公大墓如礼县大堡子山 M2、M3,在墓底中部均设腰坑,坑内均有殉狗一只、黄玉琮一件。西周秦墓中腰坑、殉狗之风更盛,礼县西山坪四座西周秦墓中有三座带腰坑殉狗;在清水李崖发掘的二十座西周墓中,有十九座带腰坑殉狗,很多墓在填土内殉狗〔2〕。众所周知,商系墓葬流行腰坑殉狗,除了商王陵,在安阳大司空村超过六成〔3〕,殷墟西区约一半的商墓带腰坑〔4〕,“殷墓中数量最多的是狗,埋狗的殷墓约占殷墓总数的三分之一”〔5〕。相反,西周时期周人墓罕见腰坑,殉狗的比例较低。甘青本地古文化墓葬中未见腰坑殉狗的报道,秦墓的这种习俗显然源自商文化。

与殉狗相关的犬祭也是秦文化的传统之一。《史记·秦本纪》:“(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也。”1980 年在陕西凤翔大辛村发掘了两座春秋时期的祭祀坑,坑呈圆袋状,坑底撒草木灰和红烧土,坑内牺牲骨骼可分四层,共出土羊十五、狗十一、猪七只,出土的完整动物骨架中,有狗骨架三副〔6〕。大辛村位于秦都雍城西郊,北依雍水河,祭祀坑正对雍城西墙南起第二门,据发掘,此门宽 10 米,路土向东延伸至城内的姚家岗宫殿区。这两个坑可能就是磔狗禳祭的遗留。秦邑门磔狗之俗应承袭自殷人,殷墟卜辞屡见犬祭〔7〕,在郑州和殷墟的建筑基址也常见犬祭遗存。

### (二)殉人及人牲习俗

公元前 621 年秦穆公葬于雍,有一百七十七人从死殉葬,包括当时的良臣奄息、仲行、针虎。秦民哀伤,赋《黄鸟》之诗。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椁室外的二层台上摆放一百六十六具殉人,其中“箱殉”七十二人,“匣殉”九十四人,在一些殉人的棺椁盖板上还有朱砂书写的文字、编号,说明当时等级森严,入葬时次序井然。大墓主人为秦景公。文献与考古对照,可知秦公大墓殉人数量之巨。春秋时秦的高等级铜器墓也流行殉人,目前发掘的五至七鼎大夫级别的墓,六成以上都有殉人,每墓殉三至七人。《史记·秦本纪》:“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其实秦殉葬之风的开始较此要早得多,礼县大堡子山 M2 的二层台上殉七人,有的带漆棺,西墓道填土内殉十二人,合计十九人。M3 的东、南二层台被盗扰,北二层台尚存一人,西

〔1〕 梁云:《从秦墓葬俗看秦文化的形成》,《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 1 期。

〔2〕 赵化成:《甘肃清水李崖遗址》,《2011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2 年。

〔3〕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 年第 1 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 1 期。

〔5〕 黄展岳:《殷商墓葬中人殉人性的再考察》,《考古》1983 年第 10 期。

〔6〕 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大辛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1 期。

〔7〕 肖春林:《殷代的四方崇拜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5 年第 1 期。

墓道填土内殉七人<sup>〔1〕</sup>。西周秦墓亦已殉人，礼县西山坪四座西周墓中有三座殉人，其中M2003为铜三鼎墓，其南北壁龕内各有一具殉人。可见秦高级贵族杀殉之风由来已久。

《秦本纪》讲秦晋韩之战，“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斋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后来因为周天子和缪公夫人的请求，晋惠公才被赦免。这条记载说明秦国祭天用人牲。秦宗庙祭祀亦用人牲，在秦雍城马家庄宗庙发现的一百八十一个祭祀坑中，人坑八座，人羊同坑一座<sup>〔2〕</sup>。2006年在大堡子山乐器坑周围发掘人祭坑四座(K1—K4)，坑内出土人骨一或二具，均为屈肢状态，多为儿童，成年仅一具。这些坑环绕乐器坑分布，其中K1轻微打破乐器坑，说明当时是先埋乐器，再杀人祭祀<sup>〔3〕</sup>。乐器坑和人祭坑位于大墓M2西南约20米，应属墓祭遗存。

商墓盛行人殉，郑州商城、安阳小屯、殷墟西北岗商王陵发现的人祭坑比比皆是。相比之下，西周时周人墓葬很少或基本不用人殉葬。周克殷后，经周公制礼作乐，周人逐渐摒弃了以人为牲的恶习<sup>〔4〕</sup>。西周早期以后，姬周贵族的墓葬基本不见殉人，说明人殉、人祭不符合周礼的根本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东夷古文化区内却流行人祭和人殉，如江苏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址，是以四块大石为中心，周围掩埋人骨二十具、人头骨二个、狗骨架十二具，人骨俯身屈膝，双手反缚，以中心大石为神祇而杀人祭祀<sup>〔5〕</sup>。春秋时期东夷国家墓葬，如山东临沂凤凰岭邾国墓、莒南大店莒国墓、滕县薛国故城薛国贵族墓，均有殉人，甚至多达十几具<sup>〔6〕</sup>。秦文化的人殉人祭习俗反映了它与商文化及东夷古文化深远的历史联系。

### (三)车马埋葬方式

商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在主墓外多设有车马坑。目前发掘的秦人车马坑年代从春秋早期延续至战国早期，包括礼县大堡子山、礼县圆顶山、甘谷毛家坪、灵台景家庄、长武上孟村、凤翔孙家南头、凤翔西村等，最多的殉有十二乘车，最少的殉有一乘车。坑内的车马埋葬形成一套固定方式，马皆呈跪伏姿态，系杀死后摆放的，有时在坑底有浅槽放置马匹。马东车西，车辕向东，马位于车辕南北两侧，马与车放置成驾乘状，即完全按照使用时的状态埋葬。多辆马车则呈东西向前后一字纵队，车马器均出土于使用时的位置。如衡饰、轸、辖、马衔、马镳、络饰，有时辕马身上蒙裹皮质甲冑。车舆内外常出土车战兵器和工具，有矛、戈、弓、矢、斧、铍、铲、钳、镢、凿等。有的坑壁有壁龕以放置马头或轴头，车轮有的置于坑底的轮槽内，舆底往往殉御奴(图一，6)。

周人流行“拆车葬”和车、马分离的埋葬方式。前者是把车拆散后置于墓道及墓室内，如张家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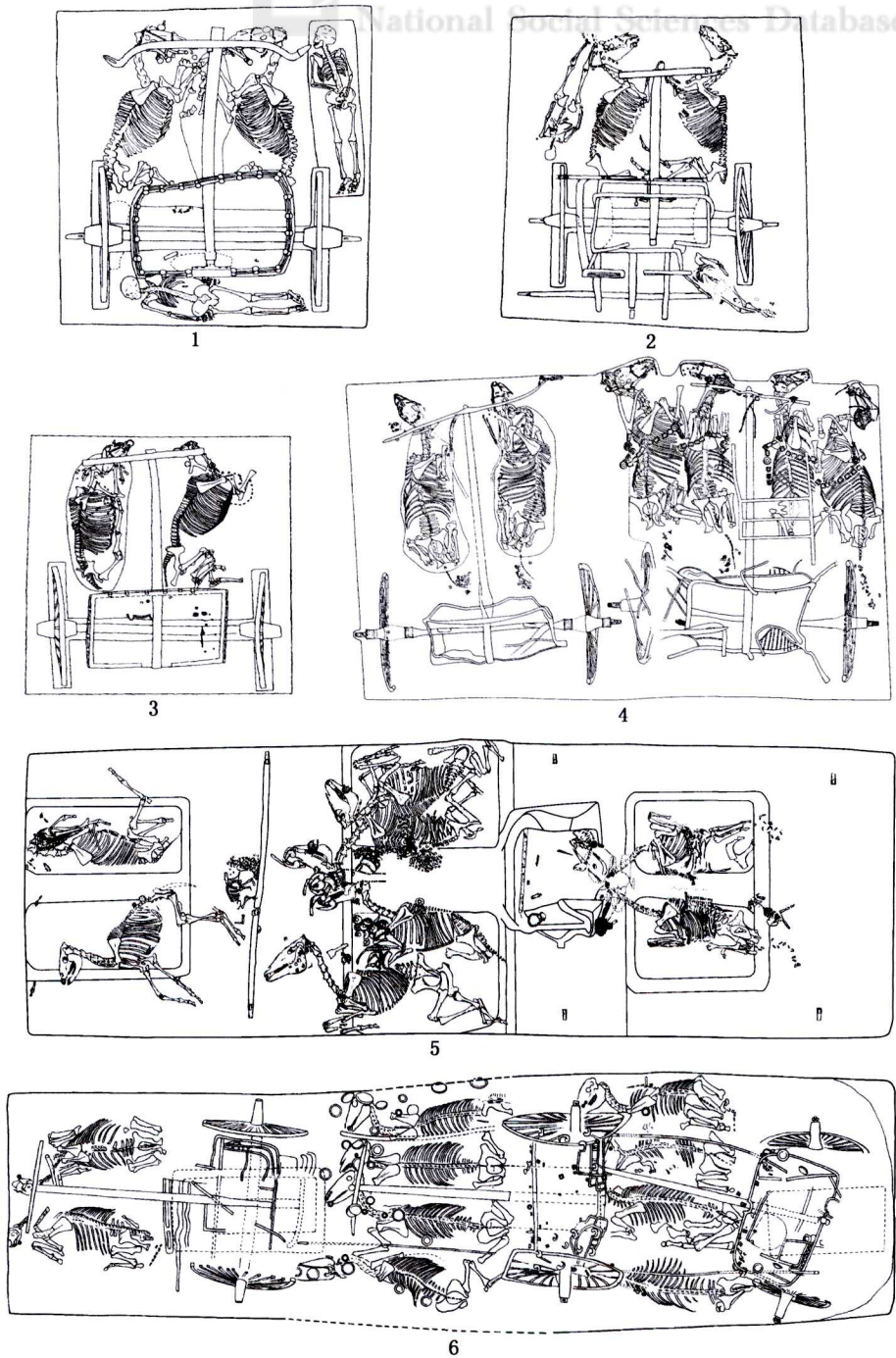
〔2〕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3〕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1期。

〔4〕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俞伟超：《连云港将军崖东夷社祀遗迹的推定》，《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6〕 山东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8年；山东省博物馆、临沂地区文物组、莒南县文化馆：《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山东省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察和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图一 车马坑

1. 郭家庄 M52 2. 梅园庄 M40 3. 郭家庄 M147 4. 张家坡 M168 5. 长安花园庄 M3  
6. 孙家南头 K3

坡 M157 是一座双墓道大墓，在墓道和檸盖板上摆放了车轮三十个、车厢十二个及轴、辘、衡、轭等，以显示墓主的财富地位；驾车的马则被活埋或杀死后置于独立的马坑中<sup>〔1〕</sup>。后者在车马坑中马下车上，或左右分置。如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车马坑，先将马杀死后置入坑底，再将车放置在马身上<sup>〔2〕</sup>。山西曲村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为东西向长方形，坑内一道南北向夯土隔墙将之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葬有至少一百零五匹马，西部埋六排四十八辆车<sup>〔3〕</sup>。东周晋系墓葬的车马坑沿袭了这个特点，由隔梁分为东部的马坑和西部的车坑，如太原赵卿墓、上马墓地、临猗程村墓地的车马坑，性质类似于马厩坑。此外，周人往往将青铜车马器置于墓室内，车马坑内极少见殉人。总之，周人车马按闲置状态，或者说非使用状态来埋葬，与秦人大不相同。

殷墟和西周时期殷遗民的车马坑内车、马常放置成驾乘状，而且经常伴出车马器、兵器、工具和殉人，与秦人的车马埋葬有相似性。如小屯、大司空村、孝民屯、白家坟、郭家庄、梅园庄的晚商车马坑，均殉一车二马，马在辘两侧侧卧或俯卧，舆外大多殉人，有的车轮置于轮槽内，舆内出土戈、弓、矢等兵器，以及弓形器、刀、镞、凿、策柄等工具<sup>〔4〕</sup>（图一，1—3）。学者指出，礼县圆顶山秦车马坑与殷墟车马坑颇为相似，表现出浓郁的商文化风格<sup>〔5〕</sup>。至于西周时期殷遗民的车马坑，如长安花园庄 M3，三乘车自南向北纵向排列，马分置于辘侧，车马器及工具、兵器齐全<sup>〔6〕</sup>（图一，5）。又如洛阳林校车马坑<sup>〔7〕</sup>、张家坡 M168<sup>〔8〕</sup>，驷马置于辘两侧的土槽内，呈跪伏姿态，有壁龛放置马头（图一，4）。一望即知与殷墟、秦人车马坑属同一系统，其渊源关系一目了然。

据文献记载，秦先祖曾为商王驾车，且擅长养马，对商人的车马埋葬方式一定熟悉而且认同。西周时期秦人重新获得贵族身份后，在车马殉葬方面采用了商人及殷遗民的而非周人的方式，就很容易理解了。2005 年在礼县西山坪发掘了四座西周时期马坑（K404—K407）<sup>〔9〕</sup>，马头向东置于龕内，驷马南北并列，嘴内衔环，中间二马间有辘痕，可能是一座一车驷马的车马坑。该坑的驷马呈驾乘状卧伏在土槽内，与春秋秦人车马坑完全一致，也与丰镐、洛阳的殷遗民车马坑如出一辙。

#### （四）商式风格陶器

对早期秦文化陶器面貌的认识，随着考古发现而逐步深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甘谷毛家坪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2010 年第 2 期。

〔4〕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 印群：《论圆顶山秦早期墓地车马坑之殷文化因素》，《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2 期。

〔6〕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1 期。

〔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林校西周车马坑》，《文物》1999 年第 3 期。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

〔9〕 赵丛苍、王志友、侯红伟：《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 年 4 月 4 日 2 版。

遗址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其面貌呈现出较纯粹的周式风格,如居址的侈口深腹瘪裆绳纹鬲,墓葬的陶器组合为鬲、盆、豆、罐,鬲均为联裆,以至于发掘者认为“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除去自身特点外,总的来说与周文化相似”〔1〕。后来学者将毛家坪西周秦文化遗存与同时期及此前的周邻考古学文化,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刘家文化、西周和先周文化相比较,认为秦文化与西周文化和先周文化的关系最密切,应源于先周文化〔2〕。又有学者将毛家坪秦文化居址一期遗存的年代提前至商代晚期,认为以甘谷毛家坪为代表的早期秦文化应源于郑家坡类型文化,是一支使用郑家坡类型文化的人群从周原西迁到甘肃东部后遗留下来的〔3〕。

2005 年,在礼县西山坪发掘的西周秦文化陶器与毛家坪的相似。2009—2011 年,在清水李崖遗址发掘三十多座西周灰坑和二十座西周墓葬,所出陶器一致,如商式方唇分裆鬲、厚方唇簋、三角划纹簋、大口尊等,这些器形在商系墓葬中常见,显然源自商文化。墓葬的陶器组合主要为鬲、簋、盆、罐,种类丰富,平均每墓达十件以上。与周人随葬陶器以单鬲或鬲、罐为主,种类、数量较少,风格简约的特点大不相同,却与西周时期某些殷遗民墓葬的陶器组合相似。李崖西周遗存的年代早于毛家坪和西山坪,是目前甘肃东部年代最早的秦文化遗存,反映出秦人在西迁之初的文化面貌还具有浓厚的殷商色彩,王朝更迭并没有中断其世代沿袭的传统。

#### (五)巨墓大陵的传统

秦国君好修巨墓大陵,“规模宏阔的巨墓大陵是秦陵体系的基本风格”〔4〕。凤翔秦公陵园占地范围有 21 平方公里。以单座墓葬论,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墓坑面积(包括墓道)有 5334 平方米,墓室容积 54888 立方米,是目前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先秦时期墓葬。巨墓大陵的传统到秦代发展到极致,秦始皇陵举全国之力修建,修陵工程到高潮时,动员的劳工约七十万人。陵园面积约 2.1 平方公里,冢高约 43 米,“树草木以象山”(《史记·秦始皇本纪》),充分体现了秦文化唯大、尚多的审美观〔5〕。

这个传统在春秋早期已露端倪。大堡子山秦公墓长 88—115 米,墓室面积 141.6—241.7 平方米,远远超过同时期的虢国国君墓(18.8 平方米)、晋侯墓(约 20 平方米),以及东周王室陵墓。东周王室陵墓如 2001 年发掘的洛阳体育场路 C1M10122,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 50.25 平方米,年代为春秋早期,被认为可能是周平王之墓〔6〕。秦因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勤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为周之藩臣,地位低于虢、晋,但墓葬极具规模,王者之气显露无遗。

礼县秦公墓的规模相当于商代方国首领级别的大墓。商代大墓与小墓面积相差悬殊,殷墟

〔1〕 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 年第 1 期。

〔2〕 牛世山:《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 年第 3 期。

〔3〕 滕铭予:《秦文化起源与相关问题再探讨》,《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 年。

〔4〕 韩伟、程学华:《秦陵概论》,《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 年。

〔5〕 林剑鸣:《秦赵同源新证》,《河北学刊》1988 年第 3 期。

〔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5 期。

西北岗商王陵墓室面积 314—359 平方米。较大型墓如武官村大墓和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墓，墓室面积分别为 168 和 160 平方米。中型墓墓室面积 10—30 平方米，如妇好墓。小型墓面积约 3 平方米。礼县秦公墓稍逊于商王陵，与苏埠屯一号墓这类方国首领级别的大墓相当，远远大于姬周诸侯墓，说明秦巨墓大陵的传统来源于商文化。

商墓等级分化严重，“商代的帝王显然高踞于包括‘王族’在内的所有贵族之上，已经成为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的君主了”〔1〕。比较而言，姬周国君墓与卿大夫墓在规模上差距不大，呈多阶层、小间隔的特点，反映出其社会资源层层下分，分化不明显。秦墓两极分化严重，国君墓和卿大夫以下级别的墓葬落差巨大，君主权力高度集中，社会结构具有上下悬隔的特征。秦人社会结构与殷人有相通之处。秦在战国时正是凭其君主权威才能彻底推行变法，一跃成为头号强国，进而扫平天下。从这个角度说，战国时秦与东方的差别不过是殷、周差别的曲折反复，只是地理空间上对调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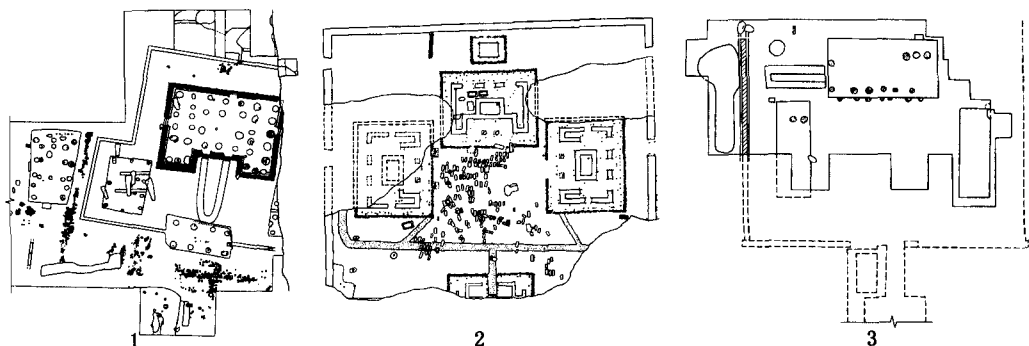
### 三 周文化因素

据《史记·秦本纪》，恶来助纣为虐被诛。其后代地位较低，一度改姓造父族的赵氏。直到非子牧马受到孝王赏识，被封于清水的秦邑，才恢复了原来的嬴姓，“号曰秦嬴”。到非子的玄孙秦仲，被宣王命为大夫，开始拥有车马礼乐。庄公依靠七千周王朝兵马，一举伐破西戎，获得“西垂大夫”的封号。襄公送平王东归，得以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文公入主关中，“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武公夫人是周王室之女。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出居郑，求助于晋、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秦景公大墓石磬铭文曰：“天子匱(燕)喜，龚(共)桓是嗣”，《石鼓文·而师》：“天子□来，嗣王始□”，周天子曾到秦地，与景公宴乐、游猎。凡此种种，都说明西周至春秋时期秦与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王室为天下共主，代表了名分正统和文化主流，秦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向周人靠拢，为周人所用，学习周礼，吸收周制，与周联姻，襄助周室，都是很自然的事。秦又居宗周故地，文化上多仍周旧，许多方面都承袭了周文化的特点。

#### (一) 宗庙、朝寝建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掘的雍城马家庄一号建筑为宗庙遗址，由祖庙、昭庙、穆庙、中庭、围墙及门塾围成全封闭式的空间。三庙呈“品”字形分布，祖庙居中偏北，平面为“凹”字形，面阔三间，由前堂、主室、后室及东西夹室组成。昭、穆庙在祖庙南，东西左右对称，形制及尺寸与祖庙相同。祖庙之北有一亭台式建筑，有角柱。院落的南门有门塾，散水以北有一东西长约 10 米的“屏”。门道在散水处左右分开，有通往昭、穆庙及东西围墙两门的踩踏路面。中庭为一中间凹下、四周稍高的空场。在中庭和祖、昭庙内发现各类祭祀坑一百八十一一个，各类坑三两成排，分

〔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94 页，文物出版社，1979 年。



图二 宗庙建筑基址

1. 云塘建筑基址 2. 马家庄一号建筑 3. 侯马呈王路 13 号地点基址

布有一定规律<sup>〔1〕</sup>。打破建筑地面的祭祀坑出土有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陶器,表明了建筑的使用年代下限。宗庙可能始建于德公,祖庙祀始封君秦襄公,静公受享于穆庙,文公和宪公是祖孙俱为昭,但又相继为国君,可能被合于同一昭庙。武公、出子为德公的兄弟,没有立庙。

马家庄宗庙的形制与经学家对周代宗庙的复原吻合<sup>〔2〕</sup>,也与考古发掘的周原云塘西周宫室建筑<sup>〔3〕</sup>,以及晋都新田的东周建筑基址有诸多相似性<sup>〔4〕</sup>,如主殿与东、西厢房之间不相连属,三者呈“品”字形分布,外围有专门的围墙,单体建筑的结构多呈“凹”字形,庭院的南部居中有门塾等(图二)。学者认为秦宗庙继承了西周时期周人建筑的风格特点<sup>〔5〕</sup>,是很对的。

勘探的马家庄三号建筑位于一号建筑西南约 500 米处,南北全长 326.5、北端宽 86、南端宽 59.6 米,面积 21849 平方米。由南向北可分五进院落、五个门庭,是一个五门三朝结构的朝寝建筑遗址。第一院落南门外有“屏”,第二院落中部偏北两侧各有一长方形建筑,第三院落正中有一座面积约 586 平方米的横长方形建筑,第四院落内有三处小型基址,第五院落正中偏北及前方两侧各有一座建筑呈品字形布列<sup>〔6〕</sup>(图三)。

雍城朝寝建筑或说明当时的诸侯可以使用五门三朝之制,或说明秦僭越使用了周天子之礼。不管怎样,秦人的门朝制度继承了周制。西周时的《小孟鼎》铭文记载了孟向周康王献俘庆赏的经过,从中可以复原西周的门朝制度<sup>〔7〕</sup>。孟“入南门”,即进入皋门;后“兽进即大廷”,即把原来在皋门里、库门外的酋长带进库门,可见“大廷”在库门里、雉门外;然后“入三门,即中

〔1〕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2 期。

〔2〕 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文物》1985 年第 2 期。

〔3〕 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 1999—2000 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 年第 9 期。

〔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呈王路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 年第 12 期。

〔5〕 徐良高、王巍:《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考古》2002 年第 9 期;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学报》2009 年第 4 期。

〔6〕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

〔7〕 李学勤:《小孟鼎与西周制度》,《历史研究》1987 年第 5 期。



廷,北向”,“三门”就是雉门,“中廷”在雉门内。对照雍城朝寝遗址,第二院落是外朝,第三院落是治朝。广义的内朝包括应门以内的部分,也就是遗址的第四、第五院落。

## (二)用鼎制度

殷人的礼器为重酒的组合<sup>[1]</sup>,殷墟贵族墓随葬的铜器多以觚、爵、觶等酒器为核心。周人的礼器则为重食的组合,以鼎、簋为核心。当然,从殷礼到周礼有一并行交错阶段。西周前期器用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以一组酒器和一组炊食器为核心构成,而且酒器普遍为实用器。西周后期以鼎、簋为标志的列鼎制度出现,形成了新的器用制度,并开始取代前者<sup>[2]</sup>。据俞伟超、高明对周代用鼎制度的研究,西周时如《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云:“天子用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东周时发生礼制僭越现象,如《仪礼》等书所载,诸侯用大牢九鼎,卿或上大夫用大牢七鼎,下大夫用少牢五鼎,士用牲三鼎或特一鼎。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卿用九鼎和庶人用陶鼎的现象<sup>[3]</sup>。

春秋至战国早期的秦墓,比同时期东方姬姓国家的墓葬还要遵循西周时期形成的用鼎制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西周至春秋早期列国单座墓葬所出的列鼎均为一套,但自春秋中期以后,晋、楚等东方国家的贵族墓普遍出土两套以上的铜列鼎(或正鼎),对照《仪礼·聘礼》,多套正鼎可能分为饪、腥两种,标志着礼制的繁缛化。迄今发现的秦墓尚无一例用两套以上铜正鼎者,始终保持着简约的特点,与西周一致。

其二,春秋中期以后,除了簋之外,东方国家墓葬中还流行盖豆、簠、敦等新的盛食器,种类较西周时期大为增加,并有取代铜簋的趋势。这些新的变化在秦基本没有发生<sup>[4]</sup>,同时期秦墓依然恪守着鼎、簋相配的西周旧制,并保持着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的齐整形式。当东方国家的鼎制在推陈出新的时候,秦人还沉浸在周人旧习之中,并引以为荣。

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秦鼎出自礼县西山坪 M2003,该墓为三鼎二簋组合,年代为西周晚期。铜鼎中一件为沿耳球腹蹄足鼎,素面,口沿下有两周凸弦纹,形制与厉王时期的多友鼎相似。一件为附耳球腹蹄足鼎,素面,形制与晋侯苏鼎相似。一件为沿耳垂腹柱足鼎,平底,沿下有窃曲纹带。垂腹柱足鼎常见于西周中期,并延续至西周晚期。春秋时期秦鼎敛口、垂腹的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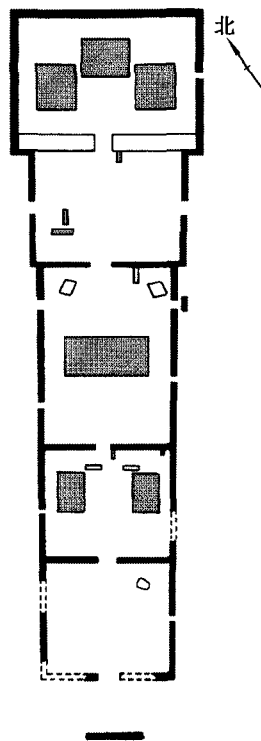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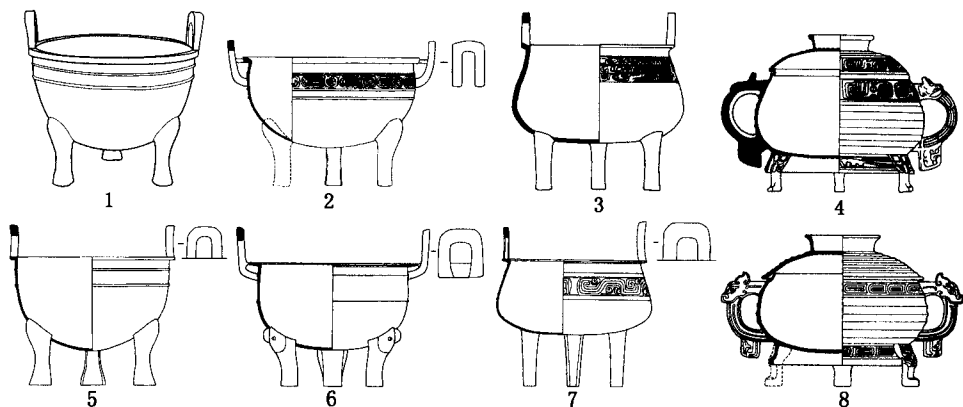
图3 马家庄三号建筑基址

[1]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

[2] 曹玮:《试论茹家庄西周墓地的器用制度——兼论西周后期器用制度的源流》,《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年。

[3] 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4] 仅仅在个别墓葬中出土了铜敦,如毛家坪 M1048,但与列鼎搭配的依然是列簋。



图四 铜礼器

1. 多友鼎 2. 晋侯墓地 M8 : 28 3. 张家坡 M320 : 3 4. 张家坡 M253 : 3 5. 西 M2003 : 18  
6. 西 M2003 : 9 7. 西 M2003 : 17 8. 西 M2003 : 13

态主要承袭了这种鼎的样式,只是由柱足变为蹄足。至于该墓所出铜簋,盖、腹均饰瓦纹,沿下有窃曲纹或重环纹带,耳下有小珥,圈足下有三小足,与关中周墓的同类器完全一致。可见秦铜礼器的组合、形制均来源于周文化(图四)。

### (三)乐悬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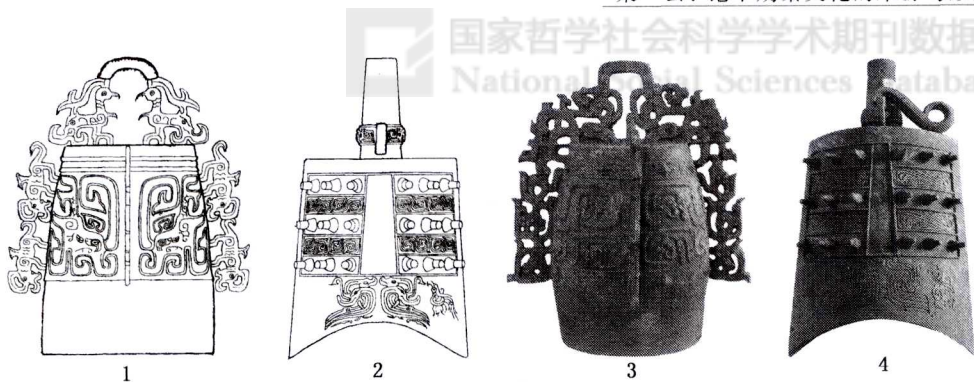
殷墟发现的商人铜制击奏乐器为“庸”,也就是一般所谓的铙,大多为三件一组,个别为五件一组(殷墟妇好墓)。庸体为合瓦形,带管状柄,柄中空与体腔相通,可插在架或座上植鸣,用于求雨或祭祀。西周时期周人首先发明了钟,并采用编悬方式进行演奏。西周早期的甬钟为三件一组(宝鸡竹园沟 M7),西周中期的甬钟有三件(长安普渡村长由墓)、四件(晋侯墓地 M9)、或五件(绛县横水 M1 及 M2)一组的,西周晚期的甬钟均为八件一组,如陕西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八件中义编钟,晋侯墓地 M8 出土的两组十六件编甬钟,成为定制<sup>[1]</sup>。西周搏不常见,目前仅见随州叶家山搏、克搏、眉县杨家村搏三例。叶家山搏属西周早期。克搏在清末出自扶风任村西周窖藏,共出甬钟若干枚。眉县搏亦出自窖藏,三件一组,还共出甬钟十件<sup>[2]</sup>,可能为两组有缺失,年代均属宣王时期(图五,1、2)。周代钟、磬往往合用,西周编磬出土不多,在张家坡井叔墓、晋侯墓地 M8、宝鸡贾村塬矢国墓、周原召陈基址都有发现,但往往散佚缺失,一组不少于五件<sup>[3]</sup>。

秦人偏好乐器搏,在乐悬中搏与甬钟一样不可或缺。已知的秦国君带铭乐器,均为有钟必有搏,如大堡子山秦子钟搏(图五,3、4)、宝鸡太公庙的秦武公钟搏、北宋内府藏的秦公搏和秦

[1]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

[2] 刘怀君,《眉县出土一批西周窖藏青铜乐器》,《文博》1987年第2期。

[3]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48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图五 铜钟

1. 眉县铜钟 2. 眉县甬钟 3. 大堡子山秦子甬钟 4. 大堡子山秦子甬钟

公钟。从形态看，秦甬钟顽固坚持了西周甬钟的椭方体样式，没有像东方国家的甬钟那样演变成合瓦体，而且带华丽的四出扉棱，只是钲部主体纹饰随时代有所变化，在列国中独树一帜。西周甬钟均带四出扉棱，如眉县甬钟两侧设透雕扁虎翼，前后设扁鸟云翼；克甬钟的钲部四出透雕扁连环夔纹翼；它们与秦甬钟的前后发展关系清楚明了。秦甬钟与西周晚期甬钟的形制相近，礼县和宝鸡秦公钟鼓部的顾首对夔纹和小鸟纹在西周晚期的钟上常见，如眉县钟、中义钟、南宫乎钟。从组合看，编甬钟三件一组、编甬钟八件一组也直承西周晚期之制。太公庙的五件甬钟花纹一致，铭文可连读但不完整，尚缺三件。大堡子山秦子乐器坑出土两组十件编磬，每组五件，分置左右。磬分两组的现象在周代较普遍，如晋侯墓地 M8 的八件磬分两堆搁置，该墓被盗，可能缺失两件<sup>[1]</sup>。上村岭 M2011(虢太子墓)<sup>[2]</sup>、侯马上马村 M13<sup>[3]</sup>、长治分水岭 M269 的石磬均分两组<sup>[4]</sup>，每组五至十件。秦人的乐悬制度袭自周人，殆无可疑。

大堡子山乐器坑内三件甬钟在西，八件甬钟在东，一字排列。与周代甬钟按大小依次编悬的规律不同，该坑八件甬钟按中间大、两边小的方式悬挂排列，西起第一、二钟的右侧鼓部都没有第二基音标志，应是整组的首钟和次钟，但又不是最大者和次大者。西起第三、四钟为形体最大和次大者，右侧鼓部反倒有第二基音标志(小鸟纹)，位置居中，不符合周代甬钟的制作、编悬通例。这或许说明当时秦人更看重编钟的礼仪象征意义，不太在乎其实际演奏功能；又或说明当时秦人尚未准确掌握编钟制作、使用的精义，处于初学阶段。到秦武公钟，这个错误得以纠正。太公庙窖坑内编钟按大小一字排列，甲、乙钟为最大和次大者，均无第二基音标志，其余三钟右侧鼓部均有小鸟纹。秦人对周乐的学习，也有一个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到了春秋晚期，

[1]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3] 山西省文物工作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

[4]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3期。

如秦景公大墓石磬铭文所云,已能做到“百乐咸奏,允乐孔煌”,即各种乐器一起合奏,乐声洪亮和谐。

#### (四) 周式风格陶器

秦人在西迁之后就与关中建立了联系。大致孝王时期的师酉簋铭文说师酉职掌邑人、虎臣,其构成中有秦夷。清水的秦人可能在非子受封前就已派人前往周都,加入王宫卫队,以捍卫王室。清水李崖遗址的西周陶器中,除了前述商式风格的,周文化因素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如联裆鬲、仿铜扉棱鬲、周式簋、双耳仿铜簋、绳纹平底盆、弦纹小罐、素面罐等。虽然周灭商后,周文化陶器随着周人的武装殖民扩散到全国,难以指证李崖这类周式器的具体来源地,但其中弦纹小罐和素面罐却肯定来自关中。此类器物商末就出现在周原礼村、凤翔西村、沔西的先周文化遗存中,西周时期在周原和丰镐遗址中常见,且自成序列。关中之外的西周遗址中几乎不见这种弦纹罐,如在天马一曲村的晋国遗址就没有发现。

西周中、晚期之际,早期秦文化转型,陶器群面貌大变,西山型陶器中商式因素消失殆尽,呈现出比较纯粹的周式风格。西山和毛家坪居址出土的西周联裆鬲,有深腹筒形瘪裆的,有短颈鼓肩的,显系模仿关中周鬲。此外,联裆甗和蛋形瓮也是关中周文化中的常见器类。墓葬的陶器组合以鬲、盆、豆、罐为主,鬲有侈口瘪裆的,有圆腹带釜的,有平折沿带扉棱的,均为联裆锥足。盆宽折平沿,深腹。豆多数为浅盘,折腹,细柄收束,中空。罐有喇叭口罐和折肩罐,前者口径尚小,肩部多带双钮。类似器形在关中周文化中基本都可见看到。早期秦文化的转型,实质是一个“去商化”的过程,即在器用方面向周文化靠拢。

#### (五) 文字特点

对秦文字特点的总结,首推王国维。他在《史籀篇疏证序》和《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中提出了有名的“古籀东西说”。1. 篆文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文字也”。2. 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3. “古文、籀文者,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沔镐故地,其文字犹有沔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1〕。这些观点,影响极大,赞成者不少,反对者亦众。

随着新的文字资料的出土或披露,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分析、检讨王氏之说。趵鼎铭文云“史留受王命书”,使学界认识到史留即史籀,确有其人,为周宣王时太史,《史籀篇》成书于彼时,而非王氏所说“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陈昭容将秦系文字、东土文字与《说文》的古、籀文全面勘合比对,发现春秋时期秦文字与籀文相同者占半数以上,战国时期降至半数以下,时代越早,籀文对秦文字的影响越大。个别文字资料与籀文的对比反映了这个情况,如秦武公钟铭文中可资与籀文对比的字形全同。秦文字中与古文相同的很少,所占比例极低,几乎可以

〔1〕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忽略不计。古文确行于战国时期的东土地区,但东土文字也有合于籀文的,说明《史籀篇》文字对东、西二土均有影响<sup>[1]</sup>。这些研究是对王氏之说的有益修正,也说明秦系文字源于西周王官采纳当时通行文字所编撰的字书,简言之,源于西周晚期文字。

有学者认为不其簋是秦器,铭文中的伯氏和不其就是《秦本纪》中的庄公昆弟<sup>[2]</sup>。此说疑点甚多,拟另文讨论,此处不作深究。《秦本纪》云:“(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秦人世代牧马御车,质朴无文,至文公初期才有史官记事,因此秦文字的出现和形成时间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早。如果将来未能发现西周时期的秦文字,也在情理之中。

目前可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秦文字资料是大堡子山秦公器、秦子器、太公庙秦武公钟彝,均属春秋早期,字体修长秀美。至于1920年代出土的天水秦公簋,王国维指出:“字迹雅近石鼓文,金文中与石鼓相近者,惟虢季子白盘及此敦耳。”<sup>[3]</sup>其实上述春秋早期秦铭与虢季子白盘更近,共性明显,如字体瘦高,均匀规整,四言韵语等。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居汧渭之会,在今汧河、渭河交汇处的东夹角一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8年)灭小虢。小虢可能是西虢余部,在虢镇附近,与秦毗邻而居约七十四年。虢季子白盘传出于宝鸡虢镇,有学者认为其年代在幽王至携王时<sup>[4]</sup>。如此,秦可能会与虢发生交集,西虢文字对秦文字的影响或许也值得注意。

## 四 西戎文化因素

据《史记·秦本纪》,周厉王时,西戎寇掠,“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宣王使庄公伐西戎,破之。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穆公用由余伐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通观这些记载,秦与戎世代为敌,攻伐不休,在言谈中也清楚地将自己置于戎狄之外,以“中国”自居。当然,有战争就有妥协,秦武公钟铭云“虢事蛮方”,即小心翼翼地处理戎狄事务,说明秦与戎也有睦邻共处的时候。秦兴起于西戎之地,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程度的“戎狄性”。战争必然带来文化交流,早期秦文化的某些因素,或者来自西戎文化,或者因西戎为媒介而来<sup>[5]</sup>。

### (一) 屈肢葬

清水李崖二十座西周墓中仅一座墓的墓主为仰身屈肢葬,双腿微屈,股骨、胫骨夹角大于

[1] 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年。

[2]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3]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4] 陈梦家认为虢季子白是辅佐携王政权的虢公翰。参见《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

[5] “西戎”泛指子午岭以西的古代少数民族,种姓繁多,占据了长城沿线的西段,是中国北方乃至欧亚草原地带人群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因素可能来自甘青地区的古文化,也可能源自欧亚草原。

90 度,另一座墓中的人骨凌乱,可能经扰动或水浸,其余十八座墓的墓主均为直肢葬。西山坪的四座西周墓中,三座相当于士级别的墓皆直肢葬,一座庶民墓为屈肢葬。毛家坪的西周墓皆屈肢葬,都相当于庶民。春秋至战国早期,秦公墓墓主的葬式为直肢葬(大堡子山 M2、M3),五至七鼎墓葬式清楚的皆为直肢葬,一至三鼎墓直肢葬和屈肢葬的比例大体相当,庶民陶器墓中屈肢葬 85%,直肢葬 4.4%。西周晚期以后中低级别秦墓中开始流行屈肢葬,从而形成了少数直肢葬人群对占人口多数的屈肢葬人群的统治模式。

屈肢葬不是嬴秦本族的传统,与嬴秦族源无关。秦文化这种蜷曲特甚的葬式在商文化和周文化中很少见到,它是秦人在陇右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结构的复杂化,在当地受到某种影响而出现的。

屈肢葬在甘青古文化中曾十分流行,半山—马厂时期在甘肃东部就流行侧身屈肢葬,为蜷曲葬式。之后的齐家文化时期,单纯的屈肢葬或以屈肢葬为主的墓地消失,代之以仰身直肢葬。齐家文化以后的青铜时代,卡约、辛店、寺洼文化都流行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仅在个别墓地有零星的屈肢葬,如合水九站的四例,青海民和核桃庄的四例,甘肃临夏莲花台的二例。1980 年代在毛家坪西周地层下发掘一座墓(TM7),人骨为头向东的仰身屈肢葬,股骨、胫骨夹角小于 90 度,随葬一件彩陶双耳圜底钵,属夏商时期。总之,秦屈肢葬可能如有的学者所说,“是当地土著习俗的继承和发展”〔1〕,其渊源目前还没有找到。

西周时期与秦文化直接接触的西戎文化是寺洼文化。在礼县调查发现了二十余处该文化的遗址,与秦文化遗址交错分布。该类遗址至今没有发掘,其葬式不得而知。合水九站、庄浪徐家碾、西和栏桥的寺洼文化墓葬,绝大多数为仰身直肢葬和二次葬,礼县如果与其一致并不奇怪。早于秦的屈肢葬,年代与之接续,空间距离又不算太远的屈肢葬文化是新疆哈密的焉不拉克文化。1986 年发掘了七十六座墓葬,墓葬营建使用土坯,葬式多为侧身屈肢葬,代表器形有单耳钵、单耳豆、腹耳壶、单耳杯,彩陶较多,主要为红地黑彩,年代大致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中晚期〔2〕。从彩陶的器形及纹样看,该文化与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其前身可能是哈密本地的天山北路文化,后者被认为是甘青地区马厂类型晚期遗存从河西走廊进入哈密盆地,再结合了部分东进的西方人群而形成的〔3〕。除了屈肢葬外,焉不拉克文化与秦文化几乎没有共同点,很难说彼此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广阔一些,会发现欧亚草原地带很早就流行屈肢葬。公元前二十世纪黑海北岸的洞室墓文化就盛行屈肢葬。公元前 2000—前 1000 年,乌拉尔以东至叶尼塞河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均有一定比例的屈肢葬。公元前八至前三世纪欧

〔1〕 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 年第 1 期。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 年第 3 期。

〔3〕 邵会秋:《东西方文化早期的碰撞与融合——从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谈起》,《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 9 期。

亚东部草原的阿尔泰、图瓦、蒙古乌兰固木等地游牧民更是广泛流行头向西的侧身屈肢葬。乌兰固木的墓葬以石材或原木为葬具，墓内实行多人侧身屈肢葬。图瓦地区分布着乌尤克文化，早期以阿尔然王陵为代表，在大石块构筑的巨冢下搭建多个椁室，主人及陪葬者均为屈肢。其中阿尔然一号冢的年代在公元前九世纪末到八世纪初<sup>〔1〕</sup>。已有学者注意到秦屈肢葬与欧亚草原的联系，认为它可能来源于西亚、中亚地区<sup>〔2〕</sup>。

公元前十至前九世纪，萨彦—阿尔泰地区的游牧民逐渐形成，公元前八至前七世纪其文化趋于鼎盛，向外扩张，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但那里与甘肃东部的秦文化距离遥远，二者之间的交流还缺少中间环节。即便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对秦的葬式有影响，也不会是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融合实现的，更大的可能是宗教信仰和丧葬观念的传播，这种传播有时仅靠少数神职人员的流动就可以完成。

考古资料表明，西周时期关中附近的居民与欧亚草原及近东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联系和人员往来<sup>〔3〕</sup>。甘肃灵台白草坡 M2 出土的一件铜勾戟，长胡三穿，斜援，直内，人头形鏃。人头高鼻深目，下颌有短须，眉毛较粗，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最典型的是周原召陈宫室建筑出土的两件蚌雕人头像，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戴尖顶筒形帽，帽尖被截掉。其中一件截面上刻一“巫”字，被作为骨笋帽使用，年代为西周晚期，发现者认为头像人种为西域的塞种<sup>〔4〕</sup>。还有学者认为头像具有写实风格，应出自中亚欧罗巴人群中的某一支，表现的可能是占卜者或魔术师的形象，周人将之改制后还刻字标识其身份<sup>〔5〕</sup>。头像说明当时周人与欧亚草原的西方人种已有接触，并了解其生活习俗。秦与周交往密切，且为周人守西陲，其辖区内有来自远方的异族人活动就不足为怪了。从这个角度思考秦屈肢葬的来源或许可行。

## （二）金器

中国先秦时期黄金制品可分为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两个系统<sup>〔6〕</sup>，前者用黄金制成耳环、手镯、臂钏、项圈等，在夏商时期的遗址中已有发现，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后者主要用金箔贴在漆木器和铜器表面，如殷墟、琉璃阁、苏埠屯商墓出土的金叶、金箔饰片。中原商周贵族习惯以铜器、玉器作为身份地位象征，不喜用金。西周晚期以后，可能受到北方的影响，一些贵族开始制作具有传统纹饰风格的金带饰，如晋侯墓地、虢国墓地、梁带村芮国墓地所出。但这只是少

〔1〕 杨建华、张盟：《阿尔然大墓在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作用——兼论中东部文化的分界》，《边疆考古研究》第 12 辑，科学出版社，2013 年。

〔2〕 赵化成：《公元前 5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工铁器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1956—1996）》，三秦出版社，1996 年；马健：《公元前 8—前 3 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 8 辑，中华书局，2008 年。

〔3〕 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胡人”形象》，《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6 期。

〔4〕 尹盛平：《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 年第 1 期。

〔5〕 水涛：《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看塞人东进诸问题》，《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年。

〔6〕 张天恩：《秦器三论——益门春秋墓几个问题浅谈》，《文物》1993 年第 10 期。

数现象,中原地区有用黄金来制作器物的习惯,春秋以后甚至出现金质容器,如曾侯乙墓的金盂、金杯、金勺。

从公元前三千纪起,欧亚草原的古代部族就开始有意识地开采金矿,制作黄金制品。到了早期铁器时代,中亚草原游牧文化形成,金器成为地位和财富的标志,黄金的开采、冶炼、制作技术长足发展,金器的品种、造型更加丰富。代表性的如图瓦地区的阿尔然 2 号冢,伊塞克湖附近的塞人金武士墓,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金器主要包括人体装饰品,当卢、马镫等马具及兵器装饰,如短剑、箭箠、箭镞的贴或包金。学者认为欧亚草原的金器文化影响了中国北方地区,并波及中原<sup>[1]</sup>。

春秋时期秦的金器主要包括四类。第一,人体服饰及护甲。如宝鸡益门村 M2 出土的金带钩、带扣、圆泡、串珠<sup>[2]</sup>。凤翔高庄 M10 出土的金襟钩<sup>[3]</sup>。大堡子山出土的口唇纹鳞形、对角云纹金箔饰片,与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所出铜饰片形制相同,被认为是用于防护人体不同部位的铠甲片<sup>[4]</sup>。第二,车器马具。如益门村 M2 出土的金络饰,马家庄宗庙遗址车坑 K17、K121 出土的鸭头形金圆策、蟠虺纹金圆泡、兽头纹金方泡、金节约、金异兽等<sup>[5]</sup>。大堡子山出土的八件鸱枭形金饰片,两两成对,左右对称,恰好可以装在一车驯马的马胄两颊上,为马胄的护颊片。第三,兵器和工具的组装部分。如益门村 M2 出土的金柄铁剑、金首铁刀或铜刀,高庄 M10 出土的金首铜削。第四,宴乐玩好之物。如大堡子山、宝鸡魏家崖出土的金虎。秦金器应用范围之广在列国中首屈一指,说明秦国统治者对黄金的喜好。虽然这些金器的形制、纹饰多为中原传统样式,但其品种范围和使用习惯却与北方地区乃至欧亚草原接近,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

秦人用黄金装饰车马的做法与西戎一致。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的墓道内一般放置三至四乘车,为髹漆彩绘或纯木质的素车,有的轮面外侧装饰成组的镂空铜片;墓室的前室内还有一乘以错金银铁条为车厢骨干,再用金银箔花饰和动物、包金铜泡、金银帽等物装饰车厢和车轮的车<sup>[6]</sup>,异常豪华珍贵。这种做法发展到最后,就是秦代乘舆中的“金根车”。《后汉书·舆服志》:“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刘昭注曰:“殷人以为大路,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车。殷曰桑根,秦改曰金根。”《乘舆马赋》注曰:“金根,以金为饰。”晚商马车未见装饰金银的,金根车是秦汉规格最高的乘舆车辆,帝王座驾,应是在秦车的传统基础上,参考周代乘舆制度,杂糅西戎车制而创制的车种,与殷车关系不大。

[1] 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 年第 3 期。

[2]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 年第 10 期。

[3] 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1 期。

[4] 张天恩:《礼县秦早期金饰片的再认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总第 11 辑,三秦出版社,2011 年。

[5]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2 期。

[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 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9 期。



### (三)铁器

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前甚至更早,西亚已经掌握了冶铁术,并逐步向周围地区传播。中国境内新疆地区至迟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开始人工冶铁,到公元前八至前六世纪,铁器的应用已相当普遍。很多学者认为新疆的铁器是由西亚传入的,而中原内地的冶铁术是从新疆经河西走廊传入的〔1〕。

中原地区春秋中期之前的人工冶铁制品主要出土于甘肃东部、关中和豫西,包括礼县大堡子山1号车马坑内“锈蚀严重的铁制品”,甘肃灵台景家庄M1出土的一件铜柄铁剑〔2〕,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墓出土的一件铜柄铁剑〔3〕,陕西长武碾子坡春秋早期灰坑(H314)出土的一把铁刀〔4〕,陕西韩城梁带村M27出土的一件铁刃铜削和一件铁刃铜戈〔5〕,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出土的一件玉柄铁剑和一件铜内铁援戈,M2009出土的一件铁叶矛。除了虢国墓地年代有争议,其他均属春秋早期。三门峡M2001出土小子吉父鬲,王恩田认为墓主是虢公忌父,虢国墓地年代为公元前760—前655年,亦属春秋早期〔6〕,不是以前认为的西周晚期。

以上数例中,甘肃和关中西部的属秦,韩城的属芮,三门峡的属虢。芮、虢的铁器仅见于国君级别的墓,可见其数量稀少,很受珍视。秦国的铁器不仅见于秦公大墓的车马坑,还见于五鼎墓(边家庄)和三鼎墓(景家庄),拥有者的范围要广得多。春秋中晚期秦国铁器屡有发现,如礼县圆顶山98LDM2出土的鎏金镂空铜柄铁剑〔7〕,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铁铲、铁锛、铁斧,孙家南头墓地出土的铁剑、铁刀、铁刃削〔8〕,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出土的铁锛〔9〕,宝鸡益门村二号墓出土的包括铁剑、铁刀在内的二十件铁器,无论种类和数量都居列国之冠。因此,秦国的铁器不会源自东方国家,更有可能是从西方传入的。

在冶铁术自西向东传入中原的过程中,偏处西北的秦国应先受影响。当然在新疆和陇东之间还需要寻找传播的中间环节。河西走廊东端沙井文化的居址和墓葬中发现多件铁器,种类有锛、鏃、刀、剑、锥形器等,具体出土单位的分期断代还有困难,年代为公元前九至前五世纪〔10〕。

〔1〕 唐际根:《中国冶铁术的起源问题》,《考古》1993年第6期;赵化成:《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工铁器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1956—1996)》,三秦出版社,1996年。

〔2〕 刘得桢、朱建唐:《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3〕 张天恩:《秦器三论——益门村春秋墓几个问题浅谈》,《文物》1993年第10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郊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社,2007年。

〔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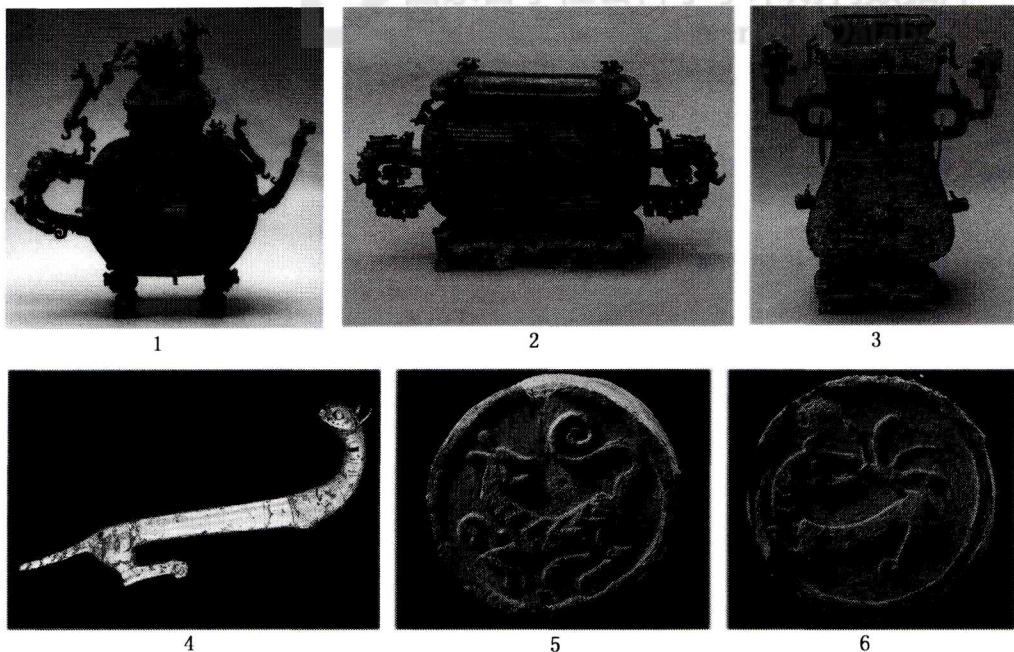
〔6〕 王恩田:《“二王并立”与虢国墓地年代上限——兼论一号、九号大墓即虢公忌父墓与虢仲林父墓》,《华夏考古》2012年第4期。

〔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甘肃礼县圆顶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第2期。

〔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

〔9〕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1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图六 遗物及纹饰

1. 秦子铜盃 2. 圆顶山铜盃 3. 圆顶山铜盃 4. 大堡子山木芯金虎 5. 单獾纹瓦当 6. 单虎纹瓦当

近年在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遗址 M444 和 M633 出土两节铁条和一件铁锈块,铁条经检测为块炼渗碳钢锻打而成,墓葬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1430—前 1260 年,这就将中国境内人工冶铁制品出现的年代提前到公元前十四世纪<sup>[1]</sup>。磨沟铁器是舶来品还是当地制作的尚不清楚,但它出土于寺洼文化早期单位,寺洼文化属历史上的西戎,说明当地戎人很早就开始接触人工冶铁制品或冶铁术。秦国经由西戎而学得冶铁术,是大概率事件。

#### (四)动物造型及纹样

西周至春秋秦的装饰艺术母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承袭了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传统纹样,并有所变化,如窃曲纹、垂鳞纹、重环纹、波曲纹、鸟纹、吐舌龙纹等。春秋中期以后由虺龙纹演变来的勾连蟠虺纹最流行,风格细密繁缛,遍布于铜器、玉器、陶器和漆器上。另一类为写实风格的动物形象,造型活泼生动,拙朴可爱,包括铜器上的附件和漆皮彩绘。如春秋早期的秦子盃,除了盖顶的卧鸟外,盖、耳连接部及肩部附铸上行回首卷尾虎及公牛,流嘴亦铸卧虎<sup>[2]</sup>(图六,1)。春秋中期的礼县圆顶山铜器,在方壶、盃、盃、方盒的盖上、沿下、肩部、底座均铸接多只圆雕动物,有虎、鸟、熊等<sup>[3]</sup>(图六,2,3),在西周铜器上从未见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1] 陈建立、毛瑞林、王辉、陈洪海、谢焱、钱耀鹏:《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文物》2012年第8期。

[2] 梁云:《秦子诸器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甘肃礼县圆顶山 98LDM2、2000LDM4 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第2期。

甘谷毛家坪 K201 车舆板外侧彩绘有豹、虎、马、兔、鹿等动物，用粗线条勾画出轮廓，内填细小圆点，虎豹呲牙咧嘴，憨态可掬（图七）；兔、鹿自由奔跑〔1〕。这些动物形象取材于现实生活，秦人擅长畜牧，频繁田猎，粗犷尚武，戎风犹存，不满足于西周青铜器谨严庄重的传统风格，而将他们喜闻乐见的动物点缀其上，获得了别开生面的艺术效果。



图七 毛家坪 K201 车舆彩绘图

战国以后社会风气日趋开放，秦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集中体现在雍城遗址出土的动物纹瓦当上，种类有凤鸟纹、单（双）獾纹、单虎纹、鹿纹、虎鹿兽纹、鹿蛇纹、虎雁纹、鹿蟾狗雁纹、豹鹿鱼纹、猎人刺虎等〔2〕。这些瓦当纹饰或者为单体动物，或者为多个动物，或者为人与野兽搏斗，构图均衡，洋溢着草原生活的气息，既不同于燕齐等地拘谨的对称式动物纹瓦当，也不同于晋楚等地的素面瓦当，将之成排装在宫殿建筑的檐前檩端，赏心悦目，清新自然，审美旨趣与东方诸国迥异。

刘莉曾指出雍城瓦当的动物纹与甘肃、内蒙古地区岩画及北方动物纹饰的相似性，如单耳双腿的侧面像、虎身的“V”形纹、环勾形爪、虎与禽兽相斗、双兽交颈构图等，并认为秦瓦的动物纹可追溯到羌、胡等民族的艺术传统〔3〕。其中“V”形纹常见于獾、虎的身躯、颈部，亦见于大堡子山木芯金虎的身上，系用朱彩绘成（图六，4—6）。秦各类动物形象是北方文化最主要的装饰母题，从长城沿线东端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到西端的卡约文化，均流行在兵器和工具上装饰或镂空动物。更靠北的斯基泰式艺术，也以丰富的动物纹著称。秦国位于农牧交汇地带，吸收周边戎狄部落的动物纹艺术为自己所用是很自然的事。

#### （五）墓室的壁龛和围墓沟

清水李崖西周墓仅一座（M17）带壁龛，龛内随葬一件绳纹罐。西周晚期以后，秦士大夫级别的墓普遍带壁龛。龛为弧顶长方形，用于放置殉人，一龛内一般殉一人，个别殉二至三人。如西山坪 M2003（三鼎墓）南、北壁龛内各殉一人；礼县圆顶山 98LDM2（七鼎墓）的北、东、南三龛内共殉七人，殉人有髹漆木棺；98LDM1（五鼎墓）南、北壁龛内各殉一人〔4〕；凤翔孙家

〔1〕 梁云、侯红伟：《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 2013 年考古收获》，《2013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 年。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秦雍城豆腐村战国制陶作坊遗址》，科学出版社，2013 年。

〔3〕 刘莉：《战国秦动物纹瓦当的艺术源流——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1983 年第 3 辑。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 年第 2 期。

南头 M191(五鼎墓)的四壁六个壁龛内各殉一人, M126(五鼎墓)的五个壁龛内各殉一人<sup>[1]</sup>; 毛家坪 M2111(三鼎墓)的南、北龛内各殉一人。在雍城近郊贵族墓中壁龛内殉人的现象也很突出。需要注意的是, 秦公大墓在二层台上和墓道填土内殉人, 没有壁龛。数量众多的庶民墓, 由于没有殉人, 也就没有壁龛。

商墓很少带壁龛, 殉人多置于二层台上, 如殷墟西区发掘的九百三十九座墓中仅十七座带有小龛, 放置随葬品<sup>[2]</sup>, 比例极低。周墓亦罕见壁龛, 1980 年代在沔西张家坡发掘的三百四十座西周竖穴墓均无壁龛<sup>[3]</sup>。商周时期, 陇山东西两侧的羌戎文化墓葬流行壁龛。如长武碾子坡相当于先周晚期的墓约半数带壁龛, 龛内放置陶鬲<sup>[4]</sup>。宝鸡高家村十九座刘家文化墓有十四座带头龛, 内置陶器<sup>[5]</sup>。近年发掘的宝鸡石鼓山西周墓, 东、南、西三壁的六个龛内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墓主可能为姜姓贵族<sup>[6]</sup>。合水九站七十九座寺洼文化的竖穴墓中, 带头龛的有六十一座, 比例很高, 龛内放置成组的陶器<sup>[7]</sup>。此外, 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有六座带有脚龛, 龛内多殉孩童, 殉人微屈或平卧, 系被杀死后塞进龛内<sup>[8]</sup>。秦贵族墓带壁龛的习俗显然为羌戎文化影响所致, 只是将壁龛的主要用途由存储器物改为摆放殉人。

围墓沟是用于标识茔域范围的界沟, 为东周秦国陵区的传统设施, 在雍城秦公陵园、芷阳秦东陵、咸阳郿战国秦陵均可见到。此外, 在山西侯马乔村、河南三门峡的战国秦墓地也有发现。2013 年在宝鸡太公庙钟傅坑的东北钻探出一座秦公大墓和一座车马坑, 在其附近亦发现了陵园的兆沟。大墓的主人应是秦武公, 可知秦陵开挖兆沟的习惯从春秋早期就开始了<sup>[9]</sup>。可能受到秦的影响, 东周时期其他国家的一些墓葬也有开挖围沟的, 如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 其四面有形状规整的隍壕, 每面中段留有通道, 年代属战国早期<sup>[10]</sup>。又如侯马乔村那些带有殉人的围沟墓, 年代为战国中期, 国别属魏<sup>[11]</sup>。1981 年曾在青海循化县苏志村发掘了两座卡约文化中晚期的坟丘墓, 在坟丘两侧各有一条弧形弯曲的围沟, 在沟内和坟丘顶上埋棺, 年代大致在西周时期。俞伟超认为坟丘和围墓沟都是西北青铜文化带给中原的影响, 秦的围墓沟正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4 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 1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社,2007 年。

[5] 高次若、刘明科、李新秦:《宝鸡高家村发现刘家文化陶器》,《考古与文物》1998 年第 4 期。

[6] 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2 期。

[7] 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研究所:《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 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 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160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9] 陈黎:《宝鸡虢镇发现一座秦公大墓秦都平阳城显露端倪》,《西安晚报》2014 年 8 月 21 日 8 版。

[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 年。

[11] 梁云:《从乔村殉人墓的文化归属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鹿鸣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五十周年李济先生发掘西阴遗址八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 年。



图八 铜钊

1. 王家村出土 2. 西拨子村窖藏 3. 甘肃博物馆藏 4. 甘峪出土 5. 东社出土

是来自西北羌戎文化的因素之一<sup>〔1〕</sup>。

#### (六) 铜钊和短剑的使用

铜钊是一种双立耳、深腹、圈足或三足的炊食具，在中国北方及欧亚草原的游牧民中广泛流行。近年各地收藏的春秋早期秦钊被披露，包括上海博物馆藏二件、加拿大藏一件、美国藏一件、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件(图八,3)，引起学界的关注。它们均有索状立耳，立于沿上，或耳根部呈蛇头状贴于器口的外沿，沿下饰兽目交连纹，深腹，腹部饰波曲纹或双层垂鳞纹，宽纹带之间隔以凸起类绳纹，喇叭状圈足。装饰风格与大堡子山秦公器一致，普遍被认为是秦器<sup>〔2〕</sup>。1979年宝鸡甘峪一座秦墓出土的铜钊，耳上有圆柱状凸起，素面<sup>〔3〕</sup>，通高21—24、口径18—22厘米(图八,4)。随着秦迁都雍城并向东发展，在凤翔附近发现铜钊，如凤翔东社<sup>〔4〕</sup>(图八,5)、东指挥村<sup>〔5〕</sup>、侯家庄的出土物<sup>〔6〕</sup>，多形体较小，通高约7厘米，腹趋浅，圈足变矮，年代为春秋中晚期。可能受到秦的影响，山西晋墓也出土了类似的铜钊，如侯马上马、临猗程村、太原金胜村墓所出，通高5—7厘米，年代主要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中原地区早于秦钊的是岐山王家村出土的铜钊，立耳顶端有乳突，深腹，圈底，矮圈足，耳部饰回纹，通高39.5、口径37.6厘米(图八,1)；钊内放置一把釜柄直刃剑和一件铜凿<sup>〔7〕</sup>，年代为西周晚期。中国北方的釜柄双刃器流行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从西周初期延续至春秋<sup>〔8〕</sup>。王家村剑两端弯卷的横栏式格与辽西剑不同(图九,7)，但其喇叭形釜柄、柄上钉孔、直刃的形态却与之相似，同为装有长秘的刺兵，类似后代的“铍”，不见于周文化，有北方草原风格。此外，北京延庆西拨子村夏家店上层文化窖藏也有铜钊，侈口，深腹，圈底残，耳部有凸棱纹，通高

〔1〕 俞伟超：《日本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2〕 李朝远：《新见秦式青铜钊研究》，《文物》2004年第1期。

〔3〕 高次若、王桂枝：《宝鸡县甘峪发现一座春秋早期墓葬》，《文博》1988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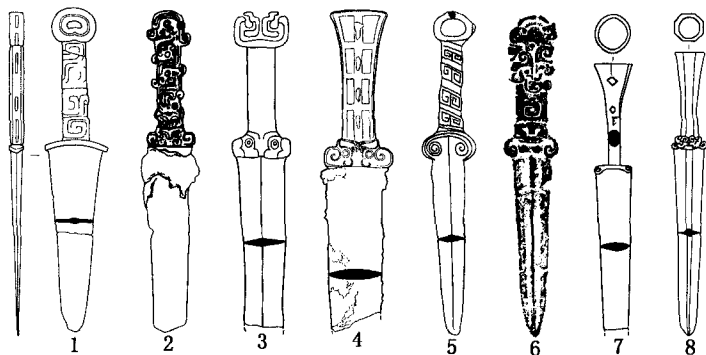
〔4〕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5〕 刘莉：《铜钊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6〕 赵丛苍：《凤翔出土一批春秋战国文物》，《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

〔7〕 庞文龙、崔玫英：《岐山王家村出土青铜器》，《文博》1981年第1期。

〔8〕 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62—81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图九 铜短剑

1. 西山坪 M2003 出土 2. A 型(边家庄) 3. B 型(谭家村 M24: 2) 4. C 型(景家庄 M1: 4) 5. 柴湾 M4 出土 6. 宇村 M1: 8 出土 7. 王家村出土 8. 齐故城 M1: 1 出土

27、口径 38 厘米。镞内有三足圈底铜鼎、柄部有三角齿状纹的铜匙、边缘有放射线纹的铜泡等<sup>[1]</sup>，年代为两周之际(图八, 2)。这两件铜器均有显著的北方风格特点, 因此学者认为秦镞应是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 与秦、戎交流有关<sup>[2]</sup>。王家村和西拨子村铜镞均为实用器, 形体较大, 经长期使用, 有修补痕迹和烟灸。

秦的春秋早期铜镞无烟灸, 加饰中原传统纹样, 已改制成礼器, 春秋中晚期又变为小型化的明器。其间的发展演变比较清楚。

扶风下务子村出土的西周晚期师同鼎铭文说“鬯(倕)戎金冑卅、戎鼎廿、铺五十、鍤(剑)廿”, 学者认为“铺”(黼)即“镞”<sup>[3]</sup>。王家村和西拨子村窖藏的镞与戎式鼎、剑共出, 恐非偶然。

目前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秦短剑近三十件。张天恩曾系统梳理了秦国境内所见春秋时期短剑, 可分三型。A 型, 格、茎、首均饰镂空的蟠螭或蟠虺纹(图九, 2)。B 型, 兽面格, 首饰蟠虺纹, 茎部多无纹饰(图九, 3)。C 型, 兽面格, 首与茎柄无明确分界, 呈曲腰喇叭形(图九, 4)。他总结它们自早到晚的演变规律, 如兽面纹轮廓线由浑圆变得方正, 格部装饰由单层发展为双层, 将其看作秦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 称之为秦式短剑, 认为它来源于西周时柳叶形短剑。具体到 A 型剑, 则直接来源于甘肃宁县宇村的那把西周晚期兽纹柄短剑<sup>[4]</sup>(图九, 6)。当然在学界也有不同意见, 陈平认为这类剑应属于北方草原直刃匕首式短剑的大系统, 不过采用了中原传统纹样和工艺, 是由北方戎狄部落直接传入秦国的<sup>[5]</sup>。杨建华将秦的这类兽面格剑称之为花格剑, 认为其来源与北方文化有关, 甚至可以追溯到欧亚草原<sup>[6]</sup>。

研究秦短剑来源时应注意三个现象。1. 扁茎柳叶形剑在西亚分布甚广, 年代不晚于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 早于中国境内的柳叶形剑, 且与其形制近似, 不排除从西亚到中国内陆的

[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村窖藏铜器》,《考古》1979 年第 3 期。

[2] 滕铭予:《中国北方地区两周时期铜镞的再探讨——兼论秦文化中所见铜镞》,《边疆考古研究》第 1 辑, 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3] 李学勤:《师同鼎试探》,《文物》1983 年第 6 期。

[4] 张天恩:《再论秦式短剑》,《考古》1995 年第 9 期。

[5] 陈平:《试论宝鸡益门二号墓短剑及有关问题》,《考古》1995 年第 4 期。

[6] 杨建华:《略论秦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1 期。

传播通道<sup>[1]</sup>。以前曾有学者指出周剑“轻吕”之名为匈奴“径路刀”的转音,认为周人短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sup>[2]</sup>。即便说秦短剑来源于西周柳叶形剑,从根源上讲,也不能排除它与北方草原部落的关系。2. 秦式短剑中的C型剑,茎、首连为一体,喇叭形剑柄,柄中空。单就剑柄的形制而言,与上述岐山王家村剑和辽西剑(双刃器)的銎柄非常相似,渊源关系十分明显,应是吸收了后者銎柄的形制特点,再加上兽面格改制而成的。类似者如临淄齐故城M1出土的一把兽面格剑,筒柄中空,内圆,外呈八菱形,近首部渐粗呈喇叭形(图九,8),年代在两周之际,发掘者称之为矛<sup>[3]</sup>。3.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秦短剑为礼县西山坪M2003所出,该剑为环首,内圈较小,首上饰下端内勾的口唇纹,茎截面为椭圆形,分三节,正面有卷曲的勾连纹残痕,侧缘有条形孔,弧形弯格,剑身柱脊(图九,1)。这把剑与春秋时的秦式短剑没有发展关系,在中原西周剑中也找不到源头,在西周秦贵族墓中出现颇为突兀。与之形制近似的剑在甘肃中部沙井文化墓葬中却有发现。永昌柴湾M4出土的一把铜剑,环首,茎亦分节,上饰四条斜方格勾连纹,弧形弯格,格下附两端内卷的勾云纹,剑身截面为菱形<sup>[4]</sup>(图九,5),与西山坪剑的共性显而易见。后者很可能来源于沙井文化。中国境内环首剑发现很少,朱开沟遗址曾出土一件(M1040:2),年代大致为商代中晚期,此后罕见。但在俄国境内米努辛斯克盆地环首剑却多有发现,有的茎部饰横箍分节、带条形孔<sup>[5]</sup>,与西山坪剑有相似之处。因此,中国周代环首剑与境外的联系值得考虑。从这三方面来看,说秦短剑完全自成系统,源自中原周剑,恐怕不妥。把秦短剑归入北方短剑系统,也忽视了它自身的特点。毋宁说它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戎华合璧的结果。

除了北方草原、西南夷地区,秦国是又一个出土短剑比较集中的区域。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短剑约四十件<sup>[6]</sup>,略多于秦剑,但其分布范围西起陇东,东至燕山,密度远低于秦短剑。横向比较,秦国出土短剑的频率和概率也远高于东方列国。如天马一曲村晋国墓地迄今已发掘墓葬约六百座,仅一座晋侯墓(M33)出土了短剑一件。在侯马上马墓地发掘的一千三百七十三座东周晋墓中未出土一件短剑。三门峡虢国墓地仅M2001出土玉柄铁剑一件,M2011出土圆首铜剑一件。春秋时期秦国三至七鼎的贵族墓约半数出土短剑,排除其中的女性墓,则元士以上级别的男性贵族几乎人人佩剑。甚至一些铜一鼎或陶三鼎的中下士级别墓也随葬短剑,如礼县圆顶山98LDM3<sup>[7]</sup>、甘谷毛家坪M1045<sup>[8]</sup>。这些现象在东方国家很难看到,说明秦贵族佩

[1] 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60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2] 俞伟超:《西周铜剑的渊源》,《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3] 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淄区文物管理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西周墓》,《考古》1988年第1期。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55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6] 张天恩:《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文物》2001年第4期。

[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

[8] 梁云、侯红伟:《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2013年考古收获》,《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4年。

剑之风相当流行。

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战争以车战为主,戈、矛及弓、矢被广泛使用,短剑只有在贴身肉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使用机会不多,因此并不流行。然而这一时期,在从东北至西南的农、牧交汇地带,短剑却一直是一种常见的器物。童恩正曾指出中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存在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例举的若干共同因素中就有青铜短剑,传播带产生的前提是相似的生态环境和半农半牧的经济特点<sup>[1]</sup>。需要注意的是,秦国恰好位于这个传播带的中腰位置。秦人的畜牧业发达,根据对礼县西山坪秦墓人骨牙齿磨耗及龋齿的分析,早期秦人的食谱为杂食并以食肉为主,经济形态为农牧兼营的混合模式<sup>[2]</sup>。短剑不仅是贴身护体的兵器,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剥皮、食肉的工具,可随身佩带。秦人生业经济与西北戎狄相近,用剑习俗乃生活习性使然。

## 五 早期秦文化的形成

史学界关于秦人的族源,长期以来有东来说和西来说的争论。前者认为秦人本是东方民族,只是后来才西迁到甘肃的,理由如秦先祖玄鸟降生的传说,嬴姓部族历史上多居东方,秦人自称为帝高阳颡项之后,并祭祀少昊等。后者认为秦人本是陇右的土著,或者说西戎的一支,理由如秦先祖“在西戎,保西垂”,秦与西戎通婚,秦的洞室墓和屈肢葬等。学者多据文献立论,比较而言,“东来说”较系统,理由也更充分。

秦人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最初人群较小,可能仅限于嬴姓宗族,后来不同地域、文化背景有别的各类人等加入其中,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一起构成了秦人这一共同体。秦人的族源在学术界一般指作为统治阶层的嬴秦宗族的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上秦文化的来源与历史学上秦人的族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来历及其固有传统自然会在文化遗存上留下鲜明的烙印,但文化遗存中各类因素出现的原因却很复杂,可能与人群的构成有关,也可能是不同人群之间交往及文化交流的结果,并不都与族源问题相关。考古学文化以物质遗存的形式而存在,包含的各类因素各有其源头,其中只是某些因素与人群共同体的族源有关。

上述三类因素中,哪一类最能代表秦人的族源?

第一类因素,即源于商文化的因素最具代表性,反映出嬴秦宗族来自东方,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受商文化影响很深。这类因素大多属于丧葬习俗,葬俗浓缩了一个民族的丧葬观念,最少

[1]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2] 尉苗、王涛、赵丛苍、陈靓、王昌燧:《甘肃西山遗址早期秦人的饮食与口腔健康》,《人类学学报》第28卷第1期,2009年。



现实功利色彩，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即便经历王朝更替、社会动荡也很难改变，往往是判断族属、探索族源的有效指标。而且这类因素在西山型阶段集中出现于高等级墓葬，与嬴秦的社会地位相吻合。

李崖型为目前发现的甘肃东部年代最早的秦文化遗存，反映了嬴秦在西迁之初，在葬俗和器用方面还保留着浓厚的殷商遗风。可以说，李崖遗址的发掘，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秦人东来说。墓葬里腰坑、殉狗所占比例之大，商式陶器所占比例之重，在西周遗址中罕见，为同时期周人墓葬远远不及。这些因素不可能是嬴秦在西周时期受他人影响所致。西周时期周人为统治阶层，代表了文化正统和主流，如果嬴秦本为西土民族，不该舍周文化而去学习弱势的殷遗民的旧习。从这个角度说，嬴秦属于广义上的殷遗民，早期秦文化李崖型其实是一支殷遗民文化。

第二类因素，即源于周文化的因素，反映了秦人对宗周礼乐文明的继承。嬴秦本为殷商臣属，由于恶来助纣为虐，被武王所诛，其后代的地位低贱，沦为造父族的附庸，甚至失去了原来的嬴姓，并改姓造父族的赵氏。西迁陇右后，面临恶劣的生存环境，要想发展谋得周王朝的认可和支支持至关重要。秦仲被周宣王封为大夫，开始跻身周人上流社会。秦庄公正是依靠宣王援助的七千兵马，才能一举伐破西戎，代表周王室在陇右行使军政管辖权。秦襄公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得以立国。在这个过程中，秦人经历了自下而上从附庸到大夫、再到诸侯的身份转变，而转变身份需要有相应的识别标志，即车服、礼器、宗庙、宫室等方面的待遇规制，如此才能进入周王朝的政治圈子，获得王室的倚重，以及与其他诸侯国对话交往的资格。因此，秦人系统地使用宗周礼乐制度，关乎其生存发展、地位，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意义。

在学习周礼的同时，秦人在器用方面也扬弃了那些源自殷商的不合时宜的旧传统，向周文化靠拢，实现了从李崖型到西山型的文化转型。

第三类因素，屈肢葬式属葬俗，壁龛、围墓沟属墓形，金器属奢侈品，铁器为舶来品，动物纹属于装饰风格，铜镞、短剑最初可能也是从外部传入的。其中屈肢葬流行于社会中下层，其他因素主要见于社会中上层。秦在建国的过程中，一方面嬴秦贵族上升为统治阶层，另一方面其辖区的臣民也越来越复杂，包括形形色色的戎人和周人。这些人与嬴秦构成了秦人这一人群共同体。秦贵族墓直肢葬和平民墓屈肢葬的差异，暗示了二者在族源上的差别，并反映了早期秦文化的地缘性特点。秦国地处西北边陲，同时又在古丝绸之路的东段，那里农、牧经济并重，古代民族混杂，使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西戎以及来自欧亚草原的因素。嬴秦虽然来自东方，但在陇右二百多年的经营中已深深扎根于这方土地，日积月累，耳闻目睹，在生活习性、审美趣味等方面与当地西戎已很接近，比如对黄金、动物纹的喜爱，佩剑习俗表现出的尚武之风等。

在西周中期的秦文化中，第一类因素还占优势。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第二、三类因素明显占优，第一类因素仅在贵族的丧葬活动中有所体现。至此，三类因素水乳交融，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化结构，一种面貌全新的秦文化终于形成了。早期秦文化其实是在一种殷



遗民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周文化和西戎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附记: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批准号:14JJD780004)的资助。

## ON THE ORIGINS AND FORMATION OF EARLY QIN CULTURE

*by*

Liang Yun

The early Qin Culture refers to the Qin Culture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early Spring-and-Autumn Period. Considering its cultural composition, we will realize that it has three main sources, namely the Shang, Zhou and Xirong (Western Barbarian) Cultures. The elements derived from the Shang Culture include the setting of waist pits and the custom of burying dogs in graves, the using of human victim and human sacrifice, the burial forms of chariots and horses, the Shang-style pottery wares and the tradition of constructing huge-scale mausoleums. These elements reflect that the Qin people initially came from the east and had strong ties with the Shang Dynasty and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hang Culture, and belonged to the *Yin Yimin* (adherents of the downfallen Shang Dynasty) in the broader sense. The elements absorbed from the Zhou Culture include the architectural types of the ancestral temples and palaces, the execution of the ritual vessel using system, the musical instrument suspension system, the Zhou-style pottery wares and the writing script features. These elements show that the Qin people learned ritual and musical cultur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had a great realistic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Qin's history. The factors derived from the cultures of the Xirong ethnic group or the northern steppes include the flexed burial position, the gold ornaments on human bodies and chariots and horses, iron wares, animal motifs on utensils, recesses on the walls of the burial pits and the ditches around the graves, the using of the bronze cauldron and daggers. Such elements reflect tha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Longyou region, the Qin people absorbed the cultures of the nearby Xirong ethnic group, the Eurasian steppes and farther beyond. The first kind of elements still occupied the superior position in the Qin Culture down to the mid Western Zhou, th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ones held preponderance from the late Western Zhou to the early Spring-and-Autumn Period, and simultaneously, the first were only shown in the aristocratic burial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remnant of the Shang Culture, the early Qin Culture came into being by widely absorbing elements of the Zhou and Xirong Cultures.

责任编辑:杨毅